

红军时期李先念



▲1940年,李先念率领新四军指战员战斗在鄂中。

1929年,受黄麻起义影响,大别山区相继爆发商(城)南起义和六(安)霍(山)起义,并分别建立了红11军第31师、第32师、第33师,相继创建了鄂豫边、豫东南、皖西革命根据地。由于李先念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,又熟悉当地的斗争情况,党组织决定调他去开展地方工作。

1929年年底,李先念转到地方工作,任中共黄安县高桥区委书记、区苏维埃政府主席。他一到任,就立即深入群众之中,调查研究,迅速建立和恢复各级党的组织,建立乡、村苏维埃政权和农会组织,组织起游击武装,成立妇女会、儿童团等群众组织。在他的领导下,高桥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,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新气象。

1931年6月,鄂豫皖红军打通了黄陂长轩岭至甘堂铺一线的联系,使黄陂以南新老苏区连成一片。为了巩固这一地区,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决定正式建立(黄)陂(黄)安南县,由李先念任中共陂安南县县委书记(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)。时年才22岁的李先念不畏困难,勇挑重担,大胆工作,很快打开了陂安南县的斗争局面。在陂安南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,他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。上任伊始,他迅速成立起苏维埃政府各领导机构。刘华清当时就在陂安南县军事指挥部工作,经常聆听李先念的讲话。李先念在抓紧全面工作的同时,重点抓军事指挥部的工作。这是全县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,在当时斗争形势下,抓住武装工作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关键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东三省沦陷,全国掀起抗日热潮。国民党却无视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,一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实行“不抵抗主义”,一面集结重兵于革命根据地周围,准备发动新的进攻。为做好反“围剿”的准备,鄂豫皖中央分局号召根据地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积极参加红军和支援红军作战,决心粉碎敌人新的“围剿”。10月17日,陂安南县召开扩大红军的大会,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动员,会后亲自率领3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。在大家欢送李先念时,他握着郭述申的手,指着旁边的刘华清说:团委书记这次随我参军了,就调刘华清接任团委书记吧。当时年仅15岁的刘华清,一直没有忘记那次欢送的热烈场面,没有忘记李先念临行前的嘱托。李先念带头参军的举动,使陂安南县扩红工作受到中央分局和特区军委会的表彰,苏区《列宁报》还进行了宣传。李先念一到部队,就被任命为红4军第11师33团政委。

1931年11月7日,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,下辖红4军和红25军。在方面军的指挥下,李先念率部先后参加了黄安、商(城)潢(川)、苏家埠、潢(川)光(山)四大战役,该团因完成战斗任务出色,被方面军总部授予“共产国际团”的光荣称号。李先念只读过3年私塾,文化不高,但是他在戎马倥偬的战争间隙,刻苦学习军事知识,把一切在军事上学有所长的同志作为求教的对象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,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。在红四方面军时期,李先念一直在徐向前的领导下艰苦奋斗。他对徐向前非常尊敬,视之为最可信的师长和榜样。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,有人这样写道:“凡是徐向前作出的决策,李先念坚决地去贯彻执行;凡是交给李先念的战斗任务,徐向前特别放心。”

1932年5月,蒋介石调集了30万大军,发动了以鄂豫皖根据地为重点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7月,李先念升任红4军第11师政委,受命于危难之际。在军事指挥中,他一贯坚持军事辩证法,尊重战争的规律,总是从敌情、我情、民情及地理情况出发,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上级的军事方针、作战原则。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冯寿二、七里坪、胡山寨等恶战中,在冲破枣阳新集、土桥铺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堵击中,后人都可看到他军事指挥上的这一个鲜明特点。

10月,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,他率部随主力而去,第一次告别了家乡湖北。途中,他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、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,为全军打开通路,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。子午镇战斗中,他身负重伤,坐着担架仍指挥部队顽强奋战,冲破敌军追堵,翻越秦岭,涉渡汉水。1932年12月,李先念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,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

李先念所带的部队素有狠、硬、快、猛、活的作风,能攻善守,敢打硬仗,常常成为战役战斗中的“铁拳头”。1933年2月,川军田頌尧部近6万人向入川不久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“三路围攻”。方面军总部采取“收紧阵地、待机反击”的作战方针,主动退到以通江县空山坝为中心、方圆约50公里的地域内,在运动防御中寻找战机,李先念担任率部迂回敌后、切断敌退路的重任。5月,空山坝决战前夕,有一次李先念冒着大雨,沿着湿滑的山路,翻过几道山冈,到担负艰巨攻击任务的红33团直接指挥作战。战士们看到浑身泥水的师政委来了,战斗情绪更加高涨。这次作战,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3个团,俘敌2万余名,缴获大批枪支、弹药、马匹。

1933年7月,红四方面军扩编,李先念担任红30军政委。10月,在宣(汉)达(县)战役中,他率部奇袭达县城,歼灭守敌,缴获大批军用物资。

1933年10月,蒋介石令四川军阀刘湘纠集110余个团约20万人,对红四方面军进行长达10个月的“六路围攻”,李先念与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。当反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,徐向前、李先念率红30军及红93师克巴中,准备进而从西北的黄猫埡、旺苍坝地区,对敌第一、二两路军实施大纵深迂回,以求围而歼之。此时,张国焘忘记东线浅近迂回作战失掉战机的教训,又从后方打电话令部队向巴中正北的长池方向进攻。徐向前提醒说,这样迂回太浅,很可能是追着敌人屁股打,张国焘不听。电话中讲来讲去,没有结果,使徐向前感到进退两难。这时,李先念大胆建议: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嘛,你叫我们往哪里打,我们就往哪里打,我们听总指挥的!”

徐向前说:“好!我们来个机断专行,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,错了我负责。”

在徐向前的指挥下,李先念率红30军沿仪凤场、雪山场火速奔袭,抢在敌人之前占领黄猫埡天险,川军10余个团皆成瓮中之鳖,1.4万人悉数被歼。

李先念渊博的军事知识和超群的指挥才能来之于勤奋,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。每次战斗发起前,只要条件许可,他就亲自踏勘预设阵地,虚心向他人请教,再三推敲作战方案,预测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;战后,则发动官兵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,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。在反“六路围攻”后,他和大家总结了5条宝贵经验,除了“收紧阵地,诱敌深入”等重要经验外,有一条就是注重培养和使用主力。红30军中有的师、团攻防能力特别强,常常担负“啃硬骨头”的任务,如“钢团”263团、“百战百胜”268团,因而部队减员就比较多。为了使这些部队保持满员,具有较强的突击力,李先念不惜缩减军机关、直属队乃至其他部队,也要及时补充主战部队,以便随时派遣他们执行最吃紧的战斗任务。

在敌数倍于我的情况下,李先念经常组织指挥部队夜间袭击,以奇制胜。因此,他非常重视夜间战斗课目的训练,常在漆黑的夜里组织部队练习行军、爬山、攀登悬崖、侦察、联络、射击、投弹,使部队具有夜间作战的特长。红30军第88师265团,是李先念亲自培养训练出来的“夜老虎”团。该团夜战登龙坪、奇袭毛坝场、智取庆云场,屡建战功,声威远振,使得敌人闻风胆颤,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该团“夜老虎”称号。这些团队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,以及灵活的战术思想和过硬的战斗作风,凝聚着李先念的大量智慧和心血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